



No. C2011009

2011-06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

冯时 徐建国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o. C2011009 2011年6月21日

摘要：本文尝试区分制度不公与收入不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与未来经济增长负相关，但是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以后，收入差距不再影响经济增长，说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不是表象上收入分布的不平，而是深层次的权利和机会的不公，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收入不平等程度受到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显著影响。一国的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是经济公正的集中体现，是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良好的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有利于减少寻租，减轻寻租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上述结果在控制了投资率，开放程度，政府支出规模，人力资本状况以后依然成立。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制度基础

¹ 徐建国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冯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作者感谢宋国青、周其仁教授的鼓励和启发，感谢陈斌开，杭静，黄益平，李涛，聂辉华，沈艳，张斌和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参与者的批评与建议。文中的错误与不准确由作者完全负责。批评与建议请联系徐建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jgxu@ccer.edu.cn。

Inequity, Inequality, and Growth

Abstract: We disentangle the effects of inequity and inequality o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inequality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future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is effect is subsumed by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equity and growth.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inequality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inequity. These findings are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vestment rate, opennes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human capita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equity is the fundamental origin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

JEL: O10, O15

引言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不仅是经济的腾飞，还有激增的收入差距。2009年，中国的基尼（Gini）系数达到了0.47，城乡居民的收入比则高达3.3。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数字分别只有0.3和2.5左右（李实、赵人伟，1999）。²而且，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我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趋势最为严重（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7）。收入不平等不仅直接影响低收入人口的福祉，影响社会的安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已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已有文献的分歧很大。早期的文献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取舍（Okun, 1975）。由于投资具有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或是由于投资存在创建成本（setup cost），或是由于富人的高储蓄倾向（saving propensity），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反而有利于减少企业家的融资成本，促进投资和财富的积累。这一结论意味着，再分配制度会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财富而抑制投资，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³

这些早期的观点近年来受到理论和实证研究多方面的质疑。Galor和Zeira（1993）、Aghion等（1999）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低收入人口无法通过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收入差距通过影响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影响经济增长。Bertola（1993）、Alesina和Rodrik（1994）、Persson和Tabellini（1994）等利用“中间投票者”模型，论证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导致中间投票者决定的税率过高，从而扭曲资源配置和投资激励，不利于增长；但当政府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尹恒等（2005）证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倒U型关系。Benhabib和Rustichini（1998）、Benabou（1996）强调不平等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不利于产权保护，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实证上，很多研究发现了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Perotti, 1996; Bourguignon, 1994; Clarke, 1995），Benabou（1996）和Aghion等（1999）综述大量实证研究后肯定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现有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尽管观察的角度和作用的机理不同，但这些理论都强调收入不平等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尝试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收入不平等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只是反映了更深层的一些影响社会公正的因素的作用？这些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是否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

本文的发问并非无的放矢。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人与人之间禀赋的差异。例如，天才的科学家、运动员、或者演艺人员的收入可能很高，但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导致产权保护不健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实际上，这些人的高收入反而可能为其他人提供工作机会，并且促使其他群体更加努力工作，激励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也可能是由于特权的存在，机会的不均等，弱势群体缺少就业机会等。这样的“不公”则会影响社会安定，影响弱势群体的物质

²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在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分别为2.57、2.53、2.50、2.24、1.98。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摘要》。

³ Lewis（1954）、Kaldor（1957）、Pasinetti（1962）、Bourguignon（1981）研究了收入分配通过储蓄投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由于富人的储蓄率比其他阶层高，储蓄和投资主要来源于富裕阶层，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认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的文献还包括，Saint-Paul和Verdier（1993），Galor和Tsiddon（1997a, b）等。

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不能笼统地看收入分配的不平，而是要看不平背后的原因，不同原因导致的不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不平本身可能是落后群体增加收入的动力，大家都一样了社会可能就没有前进的激励了，但是一些导致不平的因素，则可能同时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推测与一些经验观察吻合，比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初期除了收入分配上的差异，在人力资本、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等更根本的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探索这些因素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交叉影响，分解出更根本的影响，推导出作用的机制，是有意义的研究工作。⁴

上述讨论旨在说明探索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深层原因的重要性。现有文献对于这一问题也已有所关注，考虑的因素包括社会分裂（social fractionalization）（包括种族、语言或是信仰等导致的社会群体的分裂），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市场发展等等。种族之间教育传统的不同，可能导致技术掌握上的不平等（Glaeser, 2005）；此外，由于一个群体没有激励去支持旨在帮助其他种族群体的再分配政策，社会分裂也限制了收入的再分配（Alesina 和 Glaeser, 2004）。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对技术的需求和供给而影响不同技术水平群体之间的相对收入（Tinbergen, 1975; Eicher 和 Garcia-Penalosa, 2001）。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放松对穷人的信贷约束而降低收入不平等（Banerjee 和 Newman, 1993; Galor 和 Zeira, 1993）。然而，上述分析依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社会分裂既可以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也可以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水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有分析局限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下的人力资本积累；金融市场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的根本在于信贷约束的存在，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集中考察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收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不公”定义为产权保护无效与法治水平低下。我们认为，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是经济公正的核心。在产权得到有效保护，法治公正有效的情况下，市场是人们取得收入和积累财富的公平竞技场，市场里的每个参与者投入自己的人力、物质资本和努力，自由地进行最优化决策，不受不公正的游戏规则的制约，不担心努力的成果被人攫取，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不受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收入分配的状况反映了个体之间禀赋和努力程度的差异，而不是市场规则的不公正。

我们的定义与世界银行200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简称WDR）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WDR把社会公正定义为机会均等（equal opportunity）和对极低收入者的保护（avoidance of absolute deprivation）。机会均等是产权保护良好和法治公平有效的直接含义，例如，平等的就业机会是指每个人可以公平竞争，依靠禀赋和努力争取工作机会。用产权的语言表述，就是每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产权不受到限制，因而得到本来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需要强调的是，机会均等是指选择的过程中竞争机会的公平，而不是选择结果分布的平均。对极低收入者的保护是公正一词的第二层含义，着眼于对极弱势群体的保护，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率，有利于社会安定，因而也有利于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的维护。

本文旨在区分“不公”与“不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用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来测度“不公”，而用实际观察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来测度“不平”，并把二者与未来的经济

⁴ 比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 1960 年中高等教育年限的均值为 0.67，1970 年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变量描述见附录 1）评分的均值为 5.16；与之相比，亚洲“四小龙”国家这两个变量的对应值分别为 1.26 和 8.24，即亚洲四小龙的人力资本和法治水平都显著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由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是慢变量，且 1960 年的值缺失，我们用 1970 年的数据间接地反映两组国家的差异。

增长相关联。实际中观测到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的不公和禀赋分布的不平等的共同结果，但是只有“不公”才会导致对未来增长不利的影 响。因此，在控制了“不公”以后，不平应该不影响未来的增长。本文利用 1980-2007 年的数据验证上述猜测。已有研究大都基于 1995 年以前的数据，没有包含近 10 多年来的数据中关于经济增长的丰富信息，而且以往研究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一致，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澄清一些已有发现。

本文有三个主要发现。首先，在控制了对外开放程度，储蓄水平，政府支出规模，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以后，收入不平等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 (Bourguignon, 1994; Perotti, 1996; Alesina 和 Rodrik, 1994)。其次，在加入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以后，收入分配不再影响经济增长，说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是反映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一基础性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在对收入不平等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主要受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影响，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越高，则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而其他变量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行文如下：第二节利用一个理论模型来阐述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节介绍实证研究的数据和方法，第四节报告实证结果，第五节总结并阐述本文的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本节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理解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简单起见，我们假定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外生给定，研究在此前提下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⁵

为了集中考察收入不平等，我们考虑异质性家族，家族除了财富差异外其他方面都相同。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社会中只存在两个无限期存续的家族，每个家族每个时间点有一个存活一期的个体。期初时，个体从父辈继承遗产 (w)，并将这些遗产在消费 (c)、投资 (k) 和寻租 (b) 之间分配；在进行生产活动之前，个体可以通过寻租掠夺别人的资本，而掠夺的多少由其所持有的资本和投入到寻租中的资源共同决定，于是个体在生产时的可支配资本 (\tilde{k}) 是原有投资 (k) 与寻租投入 (b) 的函数；个体利用可支配资本进行生产，并将所有的产出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下一代，然后资本完全折旧。

模型具体设定如下。家族 i ($i=1, 2$) 在 t 期出生的个体的效用函数为：

$$u_{i,t} = \ln c_{i,t} + \rho \ln w_{i,t}, \quad 0 < \rho < 1, \quad i = 1, 2 \quad (1)$$

其中 $c_{i,t}$ 为当期消费， $w_{i,t}$ 为留给下一代的遗产， ρ 为遗赠在个体即期效用中的权重。不失一

般性，假定初始时的财富满足 $w_{1,0} \geq w_{2,0}$ 。个体的优化约束为：

$$w_{i,t-1} = c_{i,t} + k_{i,t} + b_{i,t} \quad (2)$$

⁵ 一个更加全面的考虑是把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内生，由收入分配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初始状况决定，这里面涉及到制度演变的问题，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考虑到制度演变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把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外生给定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

$$w_{i,t} = y_{i,t} = A \bar{k}_{i,t}^\beta w_{t-1}^{1-\beta} \quad (3)$$

$$\bar{k}_{i,t} = \frac{k_{i,t} b_{i,t}^\theta}{\sum_j k_{j,t} b_{j,t}^\theta} \sum_j k_{j,t} \quad \theta \geq 0 \quad (4)$$

上面 (2) 式是资源约束, (3) 式是生产函数, 其中 w_{t-1} 是 t 期期初社会总的财富水平, 这一生产函数的特征为个人的产量受到社会总的财富水平的影响, 即社会总财富对个人生产有正的外部性, 一个解释是财富水平代表了社会总的生产水平, 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 的过程促进技术进步 (Arrow, 1962; Romer, 1986)。 (4) 式中 θ 衡量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强弱, θ 越小, 产权保护越有效, 当 $\theta=0$ 时, 寻租活动没有任何回报, 产权保护最有效。(4) 式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寻租活动 (b) 只改变资本的分配, 而不产生额外的资本, 因此寻租耗费的资源对社会总体而言是一种净浪费。

在以上设定下, 家族 i 在第 t 期的个体的优化问题是在约束 (2)、(3)、(4) 下最大化其效用函数 (1), 最优化问题的结果为:

$$k_{i,t} = p(\theta, \beta) w_{i,t-1}, \quad \text{其中, } p(\theta, \beta) = \frac{\rho\beta}{1+\rho\beta(1+\theta)} \quad (5)$$

$$b_{i,t} = r(\theta, \beta) w_{i,t-1}, \quad \text{其中, } r(\theta, \beta) = \frac{\theta\rho\beta}{1+\rho\beta(1+\theta)} \quad (6)$$

即, 每个家族的个体都会将其所继承的财富按照固定的比例在消费、投资以及寻租投入之间分配。 θ 越大, 即产权保护与法制水平越无效, 分配到寻租活动中的资源比例就越高, 而分配到投资活动的资源的比例就越低。将 (5)、(6) 代入 (4) 得到:

$$\bar{k}_{i,t} = \frac{p(\theta, \beta) w_{i,t-1}^{1+\theta}}{\sum_j w_{j,t-1}^{1+\theta}} \sum_j w_{j,t-1} \quad (7)$$

(7) 式表明在产权保护不完全 ($\theta > 0$), 且期初收入不完全平等 ($w_{1,t-1} \neq w_{2,t-1}$) 时, 个人可以通过寻租的方式从他人手中掠夺资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富人投入寻租的资源更多, 从穷人手中净掠夺财富。也就是说, 由于寻租活动的存在, 收入再分配是从穷人向富人转移财富, 这与一般的收入再分配讨论的假定恰好相反。在这些讨论中, 一般的假定是富人向穷人转移支付。

根据最优化的结果, 可以算出 t 期两个家族之间收入差距 $\varphi_t = \frac{w_{1,t}}{w_{2,t}}$ 的动态路径(式(8))、家族之间收入增长率差异 $\gamma_{1,t} - \gamma_{2,t}$ 的决定⁶(式(9))以及社会总收入增长率的决定(式(10))分别为:

$$\varphi_t = \varphi_{t-1}^{(1+\theta)\beta} \quad (8)$$

⁶ 利用 (3) 式和 (4) 式, 我们可以分别得到两个家族在 t 期的收入增长率:

$$\gamma_{1,t} = \ln\left(\frac{w_{1,t}}{w_{1,t-1}}\right) = \ln A + \beta \ln p(\theta, \beta) + ((1+\theta)\beta - 1) \ln \varphi_{t-1} + \ln(\varphi_{t-1} + 1) - \beta \ln(\varphi_{t-1}^{1+\theta} + 1)$$

$$\gamma_{2,t} = \ln\left(\frac{w_{2,t}}{w_{2,t-1}}\right) = \ln A + \beta \ln p(\theta, \beta) + \ln(\varphi_{t-1} + 1) - \beta \ln(\varphi_{t-1}^{1+\theta} + 1)$$

$$Y_{1,t} - Y_{2,t} = ((1 + \theta)\beta - 1) \ln \varphi_{t-1} \quad (9)$$

$$Y_t = \ln \left(\frac{w_{1,t} + w_{2,t}}{w_{1,t-1} + w_{2,t-1}} \right) = \ln A + \beta \ln p(\theta, \beta) + \ln(\varphi_{t-1}^{(1+\theta)\beta} + 1) - \beta \ln(\varphi_{t-1}^{1+\theta} + 1) \quad (10)$$

根据 (8) 和 (9) 式，可以总结出如下关于收入差距变化的性质（命题 1）。

命题 1⁷：(1) 当 $\theta=0$ 时，由于 $\beta < 1$ ，期初财富多的家族的收入增长慢，两个家族的收入差距水平会收敛到相等；(2) 当 $0 < \theta \leq \frac{1}{\beta} - 1$ 时，期初财富多的家族的收入增长慢，两个家族的收入水平会逐渐趋于相等，但由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并非完全有效，社会中存在因寻租活动而产生的资源浪费；(3) 当 $\theta > \frac{1}{\beta} - 1$ 时，期初财富多的家族的收入水平增长快，两个家族的收入水平差距会越来越大。

命题 1 的直接含义是，当 θ 达到较高水平 ($\theta > \frac{1}{\beta}$)，即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低下到较严重程度时，富人利用自己的资源进行的寻租活动会进一步增加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导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与一些经验观察，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经历，相吻合。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发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比如产权保护的加强，也就是 θ 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度内生演进的过程 (Grossman, 1991)。需要强调的是，极端的收入两极分化只在 θ 达到较高水平时发生。在 θ 取值较低时，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这是由生产函数的边际产出递减性质决定的。命题 1 里面我们推出极端化的结果，即收入分配要么趋于平等，要么无限扩大，这是我们简单化的模型设定决定的，这种设定能突出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现实中，有多种人群，也还有其他各种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比如能力，努力程度等等。因此，对于命题 1 的恰当解读应该是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⁸

根据 (8) 和 (10) 式，关于经济增长有如下性质（命题 2）。

命题 2（证明见附录 2）：

- 1) 当 $0 \leq \theta \leq \frac{1}{\beta} - 1$ 时，根据 (8) 式，收入差距 φ 存在一个全局稳定点 $\varphi = 1$ ；根据 (10) 式，当收入分配达到稳定时，经济增长 γ 也将达到稳定增长路径 (Balanced Growth Path) $\bar{\gamma} = \ln A + \beta \ln p(\theta, \beta) + (1 - \beta) \ln 2$ ，该增长率随着 θ 增加而降低。
- 2) 当 $\theta > \frac{1}{\beta} - 1$ 时，根据 (8) 式，收入差距 φ 不存在稳定点，即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

根据 (10) 式，经济增长率并不存在稳定增长路径，但会随着期初收入差距 φ_{t-1} 的

⁷ 命题 1 和 2 均未考虑初始收入分配完全相等，即 $\varphi_0 = 1$ ，的情况。根据 (8) 和 (9) 可知，当 $\varphi_0 = 1$ 时，该系统从一开始即处于稳定增长路径，两个家族之间的收入增长率相同，即两个家族的收入在任意时刻 t 都相等。此时，根据 (10) 可知，经济增长率为 $\ln A + \beta \ln p(\theta, \beta) + (1 - \beta) \ln 2$ 。命题 2 中关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 (θ) 对这一稳定增长率的影响的分析仍然成立。

⁸ 在一个个体类型连续分布的模型中可以严格证明这一点。

扩大而降低, 最终趋近于 $\ln A + \beta \ln p(\theta, \beta)$, 这一极限增长率也随着 θ 增加而减小。

- 3) 在向均衡状态 (或极限状态) 逼近的过程中, 对于任意时刻 t , 给定期初的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率随着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给定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 经济增长率随着期初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降低。

命题 2 表明不管是在向稳定增长路径 (或极限增长率) 逼近的过程中, 还是在稳定增长路径 (或极限增长率) 上, 经济增长率都随着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直觉上, 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越无效, 寻租的收益越大, 投入到寻租活动中的资源就越多, 剩下的投入到投资活动中的资源就越少, 导致经济增长越慢。另外一个导致经济增长较慢的可能路径是, 如果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很低, 收入分配就会变得不平等 (根据命题 (1)), 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形下, 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

综合命题 1 和 2 可以看到, 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命题 1 指出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 命题 2 则指出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可见,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都是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结果, 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下文从实证角度检验这一推论。

三、 数据与方法

本节我们通过实证方法来检验模型推导的结论。我们用基尼 (Gini) 系数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⁹ 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 Deininger 和 Squire (1996)。该数据集涵盖的国家数目较多, 跨越的时间较长, 且标明了每个观测的“质量”, 被广泛认为是目前存在的衡量收入不平等质量最好的数据集, 在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Barro, 2000; Li 和 Zou, 1998; Li 等, 1998; Li 等, 2000; Keefer 和 Knack, 2002)。按照 Barro (2000) 的处理方式, 我们选取了数据库中质量最好的, 以及其他调查覆盖全国的观测点。

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数据来自于世界经济自由指标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以下简称 EFW, 见 Gwartney, Hall 和 Lawson, 2010)。该变量取值范围为 0 到 10, 数值越大表示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越高。政府支出水平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经济增长数据库第 6.3 版 (Penn World Table 6.3, 简称 PWT 6.3)。中高等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 Barro-Lee 教育数据库 (Barro 和 Lee, 2010), 其他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简称 WDI)。

本文选择研究 1980-2007 年这一时间区间内的经济增长, 这是为了在获得尽可能多的样本的同时覆盖尽量长的时间段, 这样才利于研究相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⁹ 文献中惯常使用的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方差系数、经济中最富有的 20% 与最穷的 20% 的收入比率、经济中最富有的 20% 人均所占有的收入比例等。Clarke (1995) 尝试前三个指标, 结果显示效果差别不大。我们也尝试使用了经济中最富有的 20% 与最穷的 20% 的收入比率、经济中最富有的 20% 人均所占有的收入比例, 回归结果见稳健性检验部分。此外, Deininger 和 Squire (1996) 指出, 基于收入和基于支出的基尼系数有一定的差异, 建议在做跨国研究时对基尼系数进行调整, 我们根据建议对所有基于支出的基尼系数加 0.066 以调整两种不同衡量方式的均值 (Li 和 Zou, 1998; Li 等, 1998; Li 等, 2000), 结果变化不大。另外, 本文选用基尼系数也出于样本量的考虑。

$$Growth_i = \alpha_0 + \alpha_1 GDP_i + \alpha_2 Openness_i + \alpha_3 Inv_i + \alpha_4 HC_i + \alpha_5 Gov_i + \alpha_6 Law_i + \alpha_7 Gini_i + \alpha_8 Dummy_i + \varepsilon_i$$

其中, $Growth$ 是样本期间实际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 $Gini$ 是初始的基尼系数, 由于基尼系数的样本点比较少且不连续, 数据处理时我们使用 1975-1985 年的均值来近似 1980 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以尽可能多的增加样本量。由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缓慢, 这样做是合理的, 而且取多年均值的方法可以帮助避免单个数值中的误差; GDP 是初始的实际人均 GDP 的对数值, 用于反映可能存在的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Openness$ 是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 用样本期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的均值来衡量; Inv 是样本期间投资占 GDP 比重的均值, 也是储蓄率的一个测度; HC 是人力资本水平, 用中高等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的主成分分析的第一个主成分来衡量, 以往研究往往只考虑教育水平而没有考虑人口的健康因素;¹⁰ Gov 是样本期间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的均值, 用于反映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 Law 为衡量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指标, 综合考虑了法律独立性、产权保护、对资产买卖的政策限制等因素; $Dummy$ 为指示基尼系数是基于毛收入或净收入测算的虚拟变量。¹¹ 虽然现有的很多研究在实证检验中加入了衡量一国政治民主性的变量, 但由于样本所涵盖的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无法用民主来刻画, 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没有放入这一变量。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详见附录 1。

在考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决定因素时, 我们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Gini_i = \alpha_0 + \alpha_1 GDP_i + \alpha_2 Openness_i + \alpha_3 Inv_i + \alpha_4 HC_i + \alpha_5 Gov_i + \alpha_6 Law_i + \alpha_7 Dummy_i + \varepsilon_i$$

其中, 各变量定义和处理方式与上面相同。在样本时间点的选择上, 基尼系数为 1980-1989 年均值, 其他变量都为 1980 年值。

由于本文考虑的是收入不平等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且不平等程度在国家之间的差异较大, 而对于同一国家在时间上相对稳定 (Li 等, 1998), 因此本文采用横截面回归。

四、 实证结果

表 1 简要描述我们的数据。在样本期间有完整的数据因而在回归中使用的国家有 48 个, 与以前的研究基本相同 (Barro, 2000; Li 等, 2000)。¹² 样本国家的平均年均经济增长率

¹⁰ 本文选取 1980 年所有国家的中高等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的对数形式进行主成分分析, 我们所选取的第一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 90%。选择主成分分析是由于中高等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高达 0.8 的相关性, 而且两者都反映了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水平, 这样不仅可以克服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 同时又用一个综合的指标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我们尝试过首先对所有国家的所有时间段进行主成分分析再取 1980 年值, 结果差异不大。

¹¹ 有学者在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中使用指示收入或消费基尼系数的虚拟变量, 由于本文使用横截面回归, 相比于面板回归数据量比较小, 而且样本中基于消费的基尼系数并不多, 为了增加样本之间的差异, 同时由于基于消费基尼系数同时也是基于净收入的基尼系数, 本文在使用虚拟变量时区分毛收入和净收入。

¹² 样本中的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英国、美国, 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 伊朗、约旦、摩洛哥、突尼斯, 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喀麦隆。

为 2.21%，增长最快的韩国达到 5.49%，最低的委内瑞拉为年均负增长 0.1%。各国的初始收入差异很大——人均 GDP 水平最低的国家仅为 226 美元（以 2000 年美元计价），而最高的国家达到了 28600 美元，二者相差超过 100 倍。因为人均 GDP 的分布严重右偏，我们在回归时先进行对数变换。

1980 年左右的基尼系数的均值为 0.39，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 0.4 的警戒线水平，其中基于毛收入的基尼系数的均值为 0.43（样本数为 26），基于净收入的基尼系数的均值为 0.34（样本数为 22），说明平均看来，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因素是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较大而拉高了平均值，表现在数据上就是均值大于中位数。样本期间，贸易总量占 GDP 的比重平均达到 81%，其中，贸易开放度最高的国家（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卢森堡，贸易总量分别达到了 GDP 的 4.13、2.66 和 2.21 倍。投资占 GDP 比例平均达到 23%，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平均达到 15%。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评分平均为 6.45，最高的美国达到了 9.81，最低的伊朗只有 1.76，标准差为 2.53。我们的人力资本指标是 1980 年 15 岁以上人口受中高等教育年限对数和预期寿命对数的第一个主成分，均值为 0.68，标准差为 0.89。

表 1：统计量描述

本表简要描述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样本和变量。样本区间为 1980-2007 年，对于所有分析变量无缺失值的国家共有 48 个，中国因缺失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数据而不在其中。变量中贸易开放程度为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人力资本为中高等教育年限对数与预期寿命对数的第一个主成分。平均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贸易开放程度、投资占 GDP 比例、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为 1980-2007 年间相应变量的均值，初始实际人均 GDP（对数）、人力资本、中高等教育年限、预期寿命、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为 1980 年值，基尼系数为 1975-1985 年均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2.21	1.92	1.25	-0.10	5.49
初始实际人均GDP	8662	6060	7951	226	28600
初始实际人均GDP（对数）	8.40	8.70	1.38	5.42	10.26
贸易开放程度	0.81	0.64	0.70	0.20	4.13
投资占GDP比例	0.23	0.22	0.04	0.16	0.34
人力资本	0.68	0.84	0.89	-1.60	1.92
中高等教育年限	2.22	2.01	1.32	0.63	6.13
预期寿命	68.05	70.8	7.42	47.7	76.1
政府支出占GDP比例	0.15	0.15	0.07	0.04	0.47
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	6.45	7.03	2.53	1.76	9.81
基尼系数	0.39	0.37	0.08	0.25	0.58

表 2：分析变量的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本表报告变量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其中平均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贸易开放程度、投资占 GDP 比例（投资占比）、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政府支出占比）为 1980-2007 年间相应变量的均值，实际人均 GDP 对数形式、人力资本、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取 1980 年值，基尼系数为 1975-1985 年均值，括号中为 p 值。

实际人均 GDP (对数)	贸易开放 程度	人力 资本	投资 占比	政府支出 占比	产权保护与 法治水平	基尼 系数
------------------	------------	----------	----------	------------	---------------	----------

平均实际人均	-0.12	0.45	0.05	0.54	-0.17	0.26	-0.21
GDP 增长率	(0.40)	(<.01)	(0.71)	(<.01)	(0.24)	(0.08)	(0.15)
实际人均		0.21	0.90	-0.12	-0.21	0.77	-0.43
GDP (对数)		(0.16)	(<.01)	(0.43)	(0.16)	(<.01)	(<.01)
贸易开放程度			0.22	0.42	-0.20	0.28	-0.045
			(0.14)	(<.01)	(0.18)	(0.06)	(0.76)
人力资本				-0.007	-0.10	0.75	-0.43
				(0.96)	(0.49)	(<.01)	(<.01)
投资占					-0.047	0.083	0.021
GDP 比例					(0.75)	(0.58)	(0.89)
政府支出占						-0.32	0.049
GDP 比例						(0.03)	(0.74)
产权保护							-0.47
与法治水平							(<.01)

表 2 报告主要回归变量之间的皮尔森 (Pearson) 相关系数, 表中黑体的是相关系数绝对值超过 0.4 的情形。在没有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率与开放程度、投资占 GDP 的比率显著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 后两个变量之间也是显著正相关的。此外, 经济增长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正相关, 与基尼系数负相关, 但是显著性不高或者不显著。初始的收入水平与当时的人力资本状况、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显著正相关, 与当时的基尼系数显著负相关。人力资本状况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显著正相关, 且这两个变量都与基尼系数显著负相关。最后, 基尼系数与初始人均 GDP、人力资本水平、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都显著负相关。总的看来, 衡量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与当时的经济收入水平, 以及与未来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人力资本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都高度负相关, 然而与未来经济增长的直接负相关并不显著。但是, 这里还没有控制其他变量 (比如初始收入水平), 下面我们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分解这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 3 报告主要回归结果。我们采取逐步加入变量的办法分离不同变量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回归 (1) 中只控制了初始收入水平, 基尼系数, 开放程度, 投资占 GDP 比重, 和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回归 (2) 在回归 (1) 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水平, 回归 (3) 进一步加入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 回归 (4) 在回归 (3) 中去掉人力资本看有什么变化。回归 (5) 和 (6) 考察其他变量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表 3: 主要回归结果

本表报告主要的回归结果。回归 (1) — (4) 的因变量为 1980-2007 年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均值, 回归 (5) 和 (6) 的因变量为 1980-1989 年基尼系数均值。实际人均 GDP 的对数形式、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为 1980 年值, 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对 1980 年对数形式的中高等教育年限和对数形式的预期寿命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回归 (1) — (4) 中, 基尼系数为 1975-1985 年均值, 贸易开放程度、投资占 GDP 比例、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为 1980-2007 年均值, 样本数为 48; 回归 (5) 和 (6) 中, 贸易开放程度、投资占 GDP 比例、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为 1980 年值, 样本数均为 47, 缺少的国家为新加坡。括号中为异方差调整后的 t 值, *,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0%,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1)	(2)	(3)	(4)	(5)	(6)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截距项	4.899** (2.65)	8.731*** (3.48)	8.516*** (4.48)	5.157*** (4.20)	0.346** (2.45)	0.360** (2.54)
实际人均GDP (对数)	-0.326*** (-3.23)	-0.876*** (-3.38)	-1.099*** (-4.92)	-0.642*** (-4.06)	0.00969 (0.57)	0.0170 (0.99)
基尼系数	-6.546*** (-2.73)	-4.792* (-1.97)	-2.931 (-1.24)	-4.280 (-1.53)		
贸易开放程度	0.590** (2.62)	0.576*** (3.11)	0.533*** (3.19)	0.541** (2.61)	0.0238 (1.04)	0.0189 (1.05)
投资 占GDP比重	11.28** (2.34)	9.393** (2.03)	7.650* (1.73)	9.130* (1.90)	0.0939 (0.49)	0.109 (0.63)
政府支出 占GDP比重	-2.140 (-0.87)	-3.924* (-1.90)	-2.576 (-1.47)	-0.892 (-0.43)	0.0774 (0.88)	0.00841 (0.08)
人力资本		0.988** (2.42)	0.872** (2.30)		-0.0652** (-2.21)	-0.0506 (-1.56)
产权保护 与法治水平			0.247** (2.47)	0.271** (2.50)		-0.0116** (-2.12)
虚拟变量	-0.365 (-0.95)	-0.0129 (-0.03)	0.156 (0.40)	-0.134 (-0.30)	-0.0986*** (-4.51)	-0.0982*** (-4.64)
Adj. R ²	0.422	0.491	0.569	0.516	0.449	0.483

回归(1)显示,初始收入水平与后来的经济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说明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的条件收敛现象在1980-2007年间是存在的,这与Barro等的发现一致(Barro, 1991, 1996, 2000; Durlauf等, 2005)。这一负相关在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以后逐渐变强,表明条件收敛在情况相似的国家之间更显著,这与条件收敛的原理,即更相似的国家收敛的收入水平更接近,是一致的。¹³ 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与已有研究一致(Grossman和Helpman, 1990; Barro, 1996; Frankel和Romer, 1999)。而且,开放程度的系数随着其他变量的加入变化不大,且一直保持显著,说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稳定的,并且是相对独立于其他因素的。¹⁴ 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正相关在加入人力

¹³ 我们尝试了在增长的回归中放入初始人均实际GDP对数的平方项以显示收敛速度的变化,但平方项并不显著,而且由于一次项与平方项的相关性达到了0.997,两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达到了413.50和386.28,说明平方项的加入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的回归中并没有放入初始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

¹⁴ 如果从回归中去掉新加坡、香港、卢森堡这三个贸易额非常大的国家或地区,贸易开放度的显著性明显

资本，特别是加入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以后，大幅减小，只在边际上显著，说明投资大部分是反映了这些变量的作用。一个可能性是，投资在人力资本充足，产权保护良好，法治公平有效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以后，收入不平等显著地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与 Bertola (1993)、Persson 和 Tabellini (1994)、Alesina 和 Rodrik (1994) 等的理论预测，也与 Bourguignon (1994)、Perotti (1996) 的实证发现一致。¹⁵

回归 (1) 中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但是不显著，在后面的回归中这一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增加，但是依然不高或者仍然不显著。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也可能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但是由此需要的税收对于经济有扭曲作用，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支出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两方面作用的权衡，实证结果显示在我们的样本里政府支出的作用倾向为负但是不太显著，也就是说样本区间内的状况是政府支出规模处于略微偏大（超过最优规模）的状况。

回归 (2) 加入了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这与以前的发现一致 (Barro, 1991, 1996, 2000, 2001)。加入人力资本后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模型的解释力大幅提高，R 方从 49.6% 提高到 56.7%，提高了 7.1 个百分点，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在统计上显著，在经济上也是显著的。在控制了这一额外变量以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降低（但依然显著）。统计上，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与基尼系数的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达到 -0.43）。如果没有控制人力资本变量，则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被基尼系数吸收，导致基尼系数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人力资本与基尼系数的高度负相关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力资本天然依附于个人的特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Tanzi, 1998; Galor 和 Moav, 2004)，因而，当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较高时，经济中的收入更多分配给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分布相较于物质资本可能更加均匀，因此人力资本高的国家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加平等。

回归 (3) 在回归 (2)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在控制了所有其他变量以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依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 Barro (1996)、Acemoglu 等 (2004) 的发现一致。North (1994) 认为制度作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激励以及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主要表现在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 (Acemoglu 等, 2002) —— 在良好的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下，由于产出不会被随意的剥夺，投资者有激励进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投资或技术的创新；同时，在良好的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下，由于寻租成本增加（收益降低），寻租行为减少，消耗在旨在降低寻租行为侵害的活动上的资源也减少，资源更多的被用于生产或创新活动，进而经济增长会更快 (Murphy 等, 1993)。¹⁶

降低，但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都基本没有变化。当只从回归中去掉香港和新加坡（贸易总量占 GDP 比重大于 2.5）时，所有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都基本没有变化。

¹⁵ 我们尝试在回归 (1) - (4) 中放入基尼系数的平方项以控制不同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但回归结果显示，基尼系数的平方项都不显著。

¹⁶ 初始人均实际 GDP（对数）与人力资本水平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 0.9 和 0.77，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显示，回归 (4) 中初始人均 GDP 的膨胀因子为 7.49，说明并没有非常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另一方面，虽然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但由于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不同方面的情况，如果用主成分分析将其综合成一个指标就无法看到这些不同方面影响的不同效果。另外，以往增长的文献已经证实，初始人均实际 GDP 是一个显著的控制变量，如果我们由于其与其他变量较高的相关性将其从回归中去掉，势必造成遗漏变量误差。

回归(3)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加入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以后,基尼系数的作用不再显著,而且模型的解释力进一步大幅提高,R方进一步上升了7.5个百分点达到64.2%。这里面的信号是,基尼系数只是反映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当后者没有进入模型时,基尼系数是显著的,但是当后者进入模型时,基尼系数就不显著了。统计上,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47,回归(3)显示,基尼系数中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无关的部分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影响。作为进一步佐证,我们尝试将基尼系数对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回归的拟合值和残差分别放入基准回归中,结果显示,拟合值显著但残差并不显著,说明收入不平等中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相关的部分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无关部分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另外,政府支出比重的系数在(2)中显著,在(3)中变得不再显著,说明在回归(2)中这一变量只是反映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回归(4)在回归(3)中去掉人力资本以分解人力资本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变量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这一分解的必要性来自回归(1)和(2)之间的变化,即人力资本削弱了基尼系数的作用。回归(4)显示,在只控制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而不控制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基尼系数就已经不显著了。这说明,基尼系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反映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影响,而不是人力资本的影响,尽管基尼系数与后者也是显著相关的。

回归(6)中对基尼系数的直接考察验证了上文的发现:只有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显著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且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越高,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低,这与上文的讨论是一致的。在产权受到良好保护,法治公平有效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物质与人力资本取得收入,穷人也可以通过努力致富,辅以必要的对低收入者的支持,比如小额贷款,助学信贷等等,收入差距不会无限拉大,且收入差距可能成为低收入者不懈努力的动力。相反,如果产权保护不完全,法治不公且低效,则容易滋生腐败与寻租,低收入者缺少机会,收入不平等便会越拉越大。需要指出的是,回归(5)的结果显示,在没有控制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时,人力资本显著影响收入分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收入分配越趋于平等,但当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后,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人力资本而言,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根本。

表3中一系列的回归结果和回归结果的变化,与我们的假设一致,即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只是反映了深层次的经济公正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控制了深层次的经济公正因素以后,余下的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也就是说,影响经济增长的并不是表象上的收入分配的“不平”,而是背后导致不平的“不公”。

图1和2比较刻画了基于回归(1)和回归(3)的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的偏相关程度。在没有控制人力资本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时候,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明显负相关,但是在控制了这两个变量以后,这种负相关就消失了。图3和4则刻画了基于回归(3)的人力资本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偏相关图。在控制了本文分析的所有其他变量以后,这二者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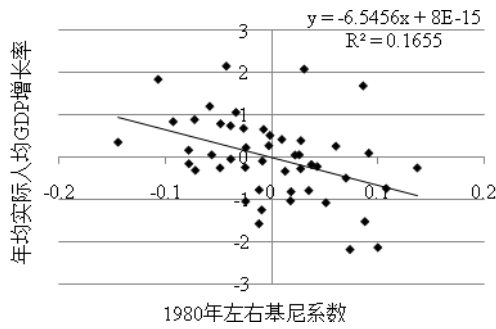


图 1：经济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偏相关图，基于回归（1）。当没有控制人力资本、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时，基尼系数与年均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的偏相关性比较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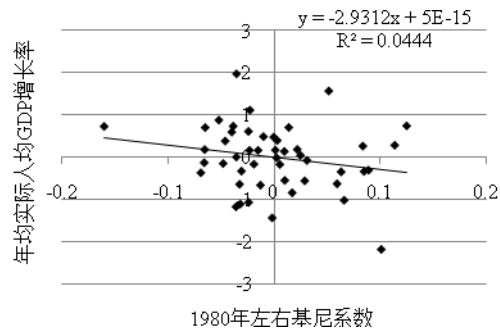


图 2：经济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偏相关图，基于回归（3）。当控制了人力资本、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时，基尼系数与年均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的相关性明显降低，统计上已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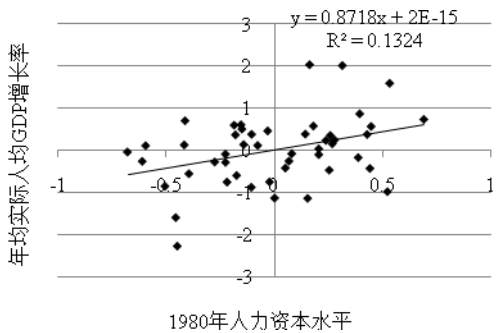


图 3：经济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偏相关图，基于回归（3）。当控制住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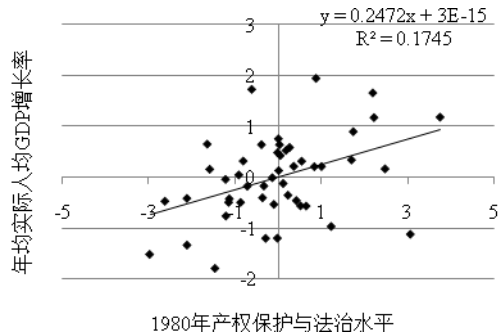


图 4：经济增长率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偏相关图，基于回归（3）。当控制住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仍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否稳定，我们使用不同的测度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包括最富有与最贫穷的 20% 人群的收入比、最富有的 20% 人群的收入占比，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定性检验，表 4 报告部分结果。表 4 显示，这两个收入不平等的测度：1) 都受到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的负向的影响，2) 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以后对未来经济增长都没有影响，且 3) 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一直保持着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正向的影响。因此，在使用了不同的不平等测度以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即衡量“不公”的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而在控制了“不公”以后，衡量“不平”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表 4：稳定性检验

本表报告稳定性检验的结果，其中，回归（1）—（3）中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变量为最富与最穷 20% 人收入比（TTB），回归（4）—（7）中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变量为最富 20% 人收入占比（TQuintile），其他变量定义及样本时间段参见表 3。括号中为异方差调整后的 t 值，*，**，***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相比，由于数据缺失，缺少的国家为智利、喀麦隆、伊朗、突尼斯。

	(1)	(2)	(3)	(4)	(5)	(6)	(7)
	增长率	TTB	TTB	增长率	增长率	TQuintile	TQuintile
截距项	6.327***	-4.827	-4.272	6.967***	5.204***	0.380***	0.388***
	(3.34)	(-0.59)	(-0.51)	(3.98)	(3.81)	(3.20)	(3.25)

人均GDP	-0.999*** (-5.07)	2.243* (1.81)	2.780** (2.25)	-0.962*** (-4.67)	-0.706*** (-6.63)	0.0118 (0.76)	0.0191 (1.22)
最富与最穷 20%人收入比	0.00171 (0.06)						
最富20%人 收入占比				-1.720 (-0.78)	-2.576 (-1.17)		
贸易开放度	0.439** (2.34)	2.731 (1.30)	2.193 (1.42)	0.457** (2.45)	0.458** (2.17)	0.0266 (1.32)	0.0193 (1.17)
投资 占GDP比重	8.757* (1.73)	-5.569 (-0.48)	-2.533 (-0.24)	8.961* (1.77)	9.836* (1.89)	0.0686 (0.41)	0.110 (0.74)
政府支出 占GDP比重	-4.273** (-2.45)	5.767 (0.97)	1.348 (0.21)	-3.986** (-2.21)	-3.211* (-1.89)	0.0837 (1.15)	0.0232 (0.27)
人力资本	0.556* (1.76)	-5.520** (-2.25)	-4.325* (-1.73)	0.495 (1.52)		-0.0629** (-2.21)	-0.0466 (-1.51)
产权保护 与法治水平	0.298*** (3.60)		-0.874** (-2.23)	0.273*** (3.15)	0.285*** (3.30)		-0.0120** (-2.38)
虚拟变量	0.69** (2.10)	-6.21*** (-4.14)	-6.10*** (-4.29)	0.549 (1.46)	0.414 (1.13)	-0.079*** (-4.19)	-0.078*** (-4.31)
Adj. R ²	0.641	0.401	0.456	0.646	0.635	0.461	0.511

五、 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对社会安定和未来经济增长产生潜在影响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区分“不公”与“不平”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探求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本质。结果显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并不是表象上的收入分配的“不平”，而是深层次的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公”。在控制了“不公”以后，表象上的“不平”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影响。因而，要防治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应该着眼于收入不平等背后的“不公”，而不是表象上的“不平”。

本文的发现，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语看似有悖，其实与这句话的真正原意恰恰相合。这里的“寡”指的并不是贫穷，而是人民数量之多寡；这里的“均”指的也并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布，而是政理之均平，法律制度设计合理，人民各得其所应得。“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说治理国家不必担心人民与土地的寡少，而应该担心政理之不均平。在这一句之后，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说政理均平，上下相安，则人口不会逃跑，人民不会穷困，国家不会灭亡。孔子强调的，并不是收入的平等，而是政理均平，君臣上下相安的秩序，有了这种秩序，国家就会兴旺，人民就能够安居乐业。

本文与这句古语遥相呼应，孔子关注的是兴邦乐业，我们研究的是经济增长，二者背后的本质其实是相通的。孔子强调政通人和，强调以公正的社会秩序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对今天我们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放在今天，政理均平的一个含义就是人们各得其所，得其所应得。如果人们得到应得的份额，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经济就会发展。不平等的收入的背后是不公正的分配制度，这种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影响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不利于资源向生产性活动充分流动，妨碍生产的进步，这才是分配不公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们担心的不应该是表象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背后的社会公正，即人们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的产权应得到良好保护，可以在市场中机会均等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社会秩序应置于合理公正的规则之下，不应该有高于法律的特权存在。二是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的眼光点不应该是收入分配的平等，而应该是建立公正的制度，创造更多的、公平的机会。社会再分配政策应该仅仅限于保障最低收入人群的最基本生活，保障社会安定。

参考文献

- [1] 李实、赵人伟，1999：《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第4期，第3-17页。
- [2]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5：《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研究》第4期，第17-22页。
- [3]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7, Nov., PP1231-1294.
- [4]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4,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P. Aghion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
- [5] Aghion, P., E. Caroi and C. Garcia-Penalosa, 1999,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7, Dec., PP1615-1660.
- [6] Alesina, A. and D.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May, PP465-490.
- [7] Alesina, A. and E. L. Glaeser, 2004, *Fighting Poverty in US and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9, Jun., PP155-173.
- [9] Banerjee, A. V. and A. F. Newman, 1993,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Apr., PP274-298
- [10] Barro, R. J., 1991,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May, PP407-443.
- [11] Barro, R. J., 1996,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NBER Working Paper No. 5698.
- [12] 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5, Mar., PP5-32.
- [13] Barro, R. J., 2001, "Human Capital: Growth, History and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May, PP12-17.
- [14] Barro, R. J. and Jong-Wha Lee, 2010,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 World, 1950-2010”,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902.
- [15] Benabou, R., 1996,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Volume 11.
- [16] Benhabib, J. and A. Rustichini, 1998,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Mar., PP125-142.
- [17] Bertola, G., 1993, “Factor Shares and Savings in Endogenous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Dec., PP1184-1198.
- [18] Bourguignon, F., 1981, “Pareto Superiority of Unequalitarian Equilibria in Stiglitz’ Model of Wealth Distribution with Convex Saving Function”, *Econometrica*, Vol. 49, Nov., PP1469-1475.
- [19] Bourguignon, F., 1994,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In G. Ranis (ed.) *En Route to Modern Growth*,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 Clarke, R. G., 1995, “More Evide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7, Aug., PP403-427.
- [21] Deininger, K. and L. Squire, 1996,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0, Sep., PP565-591.
- [22] Durlauf, S. N., P. A. Johnson, and J. R. W. Temple, 2005, “Growth Econometrics”, In P. Aghion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
- [23] Eicher, T. and C. Garcia-Penalosa, 2001, “Inequality and Growth: The Dual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6, Oct., PP173-197.
- [24] Frankel, J. A. and D. Romer, 1999, “Does Trade Cause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Jun., PP379-399.
- [25] Galor, O. and J. Zeria, 1993,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0, Jan., PP35-52.
- [26] Galor, O. and O. Moav,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1, Oct., PP1001–1026.
- [27] Galor, O. and D. Tsiddon, 1997a,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 Mar., PP93-124.
- [28] Galor, O. and D. Tsiddon, 1997b,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Jun., PP363-382.
- [29] Glaeser, E. L., 2005, “Inequality”, HIER Discussion Paper 2078.
- [30]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 1990, “Trade, Innovation,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May, PP86-91.
- [31] Grossman, H., 1991,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Insurrec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1, Sep., PP912-921.
- [32] Gwartney, J. D., J. C. Hall and R. Lawson, 2010, “2010 Economic Freedom Dataset”,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0 Annual Report*.
- [33] Heston, A., R. Summers and B. Aten,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3,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 Income and Pr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ug. 2009.
- [34] Kaldor, N., 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67, Dec., PP591-624.
- [35] Keefer, P. and S. Knack, 2002, “Polarization, Politics and Property Rights: Links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Public Choice*, Vol. 111, Mar., PP127-154.
- [36] Li, H. and H. Zou, 1998,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 Evidenc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 Oct., PP318-334.
- [37] Li, H, L. Squire and H. Zou, 1998,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temporal Variations in Income Inequa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Jan., PP26-43.
- [38] Li, H, L. Xu and H. Zou, 2000, “Corrup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2, Jul., PP155-182.
- [39]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22, May, PP139-191.
- [40] Murphy, K. M.,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3,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May,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undred and 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P409-414.
- [41] North, D. C.,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Jun., PP359-368.
- [42] Okun, A. M., 197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43] Perotti, R., 1996,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Jun., PP149-187.
- [44] 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1994,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Jun., PP600-621.
- [45] Pasinetti, L., 1962, “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9, Oct., PP267-279.
- [46]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Oct., PP1002-037.
- [47] Saint-Paul, G. and T. Verdier, 1993, “Education, Democrac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2, Dec., PP399-407.
- [48] Tanzi, V., 1998, “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of In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MF Working Paper.
- [49] Tinbergen J., 1975, *Incom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Policie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 [5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7,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IMF Annual Report

附录 1: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名	数据来源	说明
Growth	平均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	WDI (2009)	80-07 年人均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 (%)
GDP	初始实际人均 GDP	WDI (2009)	1980 年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值
Gov	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	PWT 6.3	增长回归中为 80-07 均值 不平等回归中为 1980 年值
Openness	贸易开放程度	WDI (2009)	增长回归中为 80-07 均值 不平等回归中为 1980 年值
Inv	投资占 GDP 比例	WDI (2009)	增长回归中为 80-07 均值 不平等回归中为 1980 年值

Law	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	EFW	1980 年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指标 (0 到 10 取值), 值越大表示更好的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
	预期寿命	WDI (2009)	1980 年预期寿命的对数值
	受教育年限	Barro-Lee (2010)	1980 年 15 岁以上人口中高等教育年限的对数值
HC	人力资本	Estimated	通过对 1980 年预期寿命对数及中高等教育年限对数的主成分分析得到
Gini	基尼系数	DS (1996)*	增长回归中为 75-85 年均值 不平等回归中为 80-89 年均值
Dummy	虚拟变量	DS (1996)	Dummy=1 说明基尼系数基于净收入测算 Dummy=0 说明基尼系数基于毛收入测算

* DS (1996) 表示 Deininger, K. and L. Squire, 1996, "A 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0, Sep., PP565-591.

附录 2: 命题 2 的证明

定义 $\varphi_t = \frac{w_{1,t}}{w_{2,t}}$, 为两个家族的收入差距, 由于模型的对称性, 不失一般性, 假设 $w_{1,0} > w_{2,0}$

(初始收入分配完全相等时的讨论请见脚注 9), 根据 (10) 式可得到如下 t 期经济增长 γ_t 和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 θ 以及期初收入差距 φ_{t-1} 的关系:

$$\frac{\partial \gamma_t}{\partial \theta} = -\frac{\rho^2 \beta^2}{(1 + \rho\beta(1 + \theta))^2} + \frac{\beta \varphi_{t-1}^{(1+\theta)\beta} \ln \varphi_{t-1}}{\varphi_{t-1}^{(1+\theta)\beta} + 1} - \beta \frac{\varphi_{t-1}^{1+\theta} \ln \varphi_{t-1}}{\varphi_{t-1}^{1+\theta} + 1} \quad (\text{A2.1})$$

$$= -\frac{\rho^2 \beta^2}{(1 + \rho\beta(1 + \theta))^2} + \beta \left(\frac{\varphi_{t-1}^{(1+\theta)\beta}}{\varphi_{t-1}^{(1+\theta)\beta} + 1} - \frac{\varphi_{t-1}^{1+\theta}}{\varphi_{t-1}^{1+\theta} + 1} \right) \ln \varphi_{t-1} \quad)$$

$$\frac{\partial \gamma_t}{\partial \varphi_{t-1}} = \frac{(1 + \theta)\beta \varphi_{t-1}^{(1+\theta)\beta - 1}}{\varphi_{t-1}^{(1+\theta)\beta} + 1} - \beta \frac{(1 + \theta)\varphi_{t-1}^\theta}{\varphi_{t-1}^{1+\theta} + 1} \quad (\text{A2.2})$$

$$= \frac{(1 + \theta)\beta \varphi_{t-1}^\theta}{(\varphi_{t-1}^{(1+\theta)\beta} + 1)(\varphi_{t-1}^{1+\theta} + 1)} \times (\varphi_{t-1}^{(1+\theta)(\beta-1)} - 1) \quad)$$

(1) 命题 2.3:

由 $\varphi_0 > 1$ 和 (8) 式有, 对于任意时刻 t 有 $\varphi_{t-1} > 1$, 又因为 $\beta < 1$, $\varphi_{t-1}^{(1+\theta)\beta} < \varphi_{t-1}^{1+\theta}$,

因此 A2.1 式等号右边第二项为负, $\frac{\partial \gamma_t}{\partial \theta} < 0$ 。即给定期初的收入差距, 随着产权保护与法

治水平的增强, 经济增长率增大。

此外, $\varphi_{t-1}^{(1+\theta)(\beta-1)} - 1 < 0$, 因而根据 A2.2 式有 $\frac{\partial \gamma_t}{\partial \varphi_{t-1}} < 0$ 。即期初的收入差距越大,

当期的经济增长率越缓慢。

(2) 命题 2.2:

当 $\theta > \frac{1}{\beta}$ 时, 由 $\varphi_0 > 1$ 和 (8) 式有, φ_t 是时间 t 的增函数, 则由 A2.2 可知 γ_t 是时间 t

的减函数。因此, 根据 (10) 式有, $\varphi \rightarrow \infty$ 时, $\gamma \rightarrow \ln A + \beta \ln p(\theta, \beta)$ 。即当 $\theta > \frac{1}{\beta}$ 时, 经

济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降低, 逐渐趋近于极限增长率。